

广玉兰挺拔至今

这里的老住户们说，院子里这4棵广玉兰是当年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方送的，同时搬来的还有很多太湖石，在院里堆砌成山。数十年后，太湖石被搬往静安公园造景了，只剩广玉兰挺拔至今。

穿过前院的林木折向西部，可见一道嵌着漏窗的花墙，花墙中部嵌着一个月洞门（尽管现已破旧不堪），进门来就是内院。院子南北两头各有一幢建筑，北侧的那幢方方正正，西洋派头，是一幢三开间的四层钢筋水泥大楼，一望便知，这就是主人的住宅。南侧的一幢则是一栋标准古典风格的八角二层小楼。楼顶原先铺的是琉璃瓦，八个飞檐上都有吉祥物装饰，底层基座有好看的围栏。如今，琉璃瓦和吉祥物都不存在了。在1951年以前，这里是一个名人荟萃、书香缭绕、上海滩数得着的高雅地方。张元济、罗振玉、罗振常、李济、商承祚、陈梦家、胡厚宣、容庚、傅斯年、陈叔通、郑振铎……这批顶级的古文化研究学者，都喜欢来这里看看藏品，与主人切磋切磋，尤其是研究甲骨文、青铜器和宋元版本目录的人。

院子原来的主人刘晦之（名体智 1879—1962），安徽庐江人，是李经方的内弟。父亲是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璋，在浙江巡抚任内时，亲自指挥了中法之战中著名的镇海战役，打了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一个大胜仗。作为良将之子，刘晦之在家排行老四，没打上仗，也没有什么科举上的功名，却抓住了经商和收藏的好机会，成了银行家和收藏家。

有奖储蓄掀风波

刘晦之曾在金融界做事，1919年任中国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。十几年后的一场金融风潮中，刘晦之当上了总经理，把总行迁到了上海，并在北京东路虎丘路口，建起了中国实业银行大厦，如今仍在。

1933年，刘晦之在上海举办了声势浩大的“特别有奖储蓄”。这种“特别有奖储蓄”是跟法国人学来的，八年为一期，每年开奖四次，储户可整买，也可零买，特奖1万元，到期还本还息。这种储蓄开奖机会多，容易吸引公众。果然公告一出，全国轰动。出于中奖致富的心理，储户纷纷来认购。当时中国实业银行在全国有20多个分行和办事处，各分支行每天都收入大量现金，这样一来，该行的储蓄资金一度达到了4000万元。这在当时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，已经超过了交通银行和中央银行，仅次于中国银行。

中实银行的飞速发展引起中外银行界的妒忌。宋子文见“特别有奖储蓄”如此红火，心里很不舒服。不少银行界人士也跑到宋子文面前告状，说刘晦之抢了大家的生意，要宋子文出面制止。

此时的宋子文，正在准备推行“航空奖券”，怕刘晦之的“有奖储蓄”影响“航空奖券”的发行，于是下令中止了中实银行的这棵“摇钱树”。刘晦之得知后，立即托人去说情，宋子文借机猛敲竹杠，要他拿出60万元法币，否则就立即停办。刘晦之算了笔账，如果拿出60万元，“有奖储蓄”就无利可图，不如不办。

1935年宋子文接受了英国人的建议，在全国实行法币政策，把发行钞票权收归国家银行，兼并了那些他不喜欢的私人银行。这时中国实业银行被宣布“改组”，原中央银行的国库局长胡孟嘉被派到行里当总经理。刘晦之被夺了权，心灰意懒，索性一头钻到他的小校经阁里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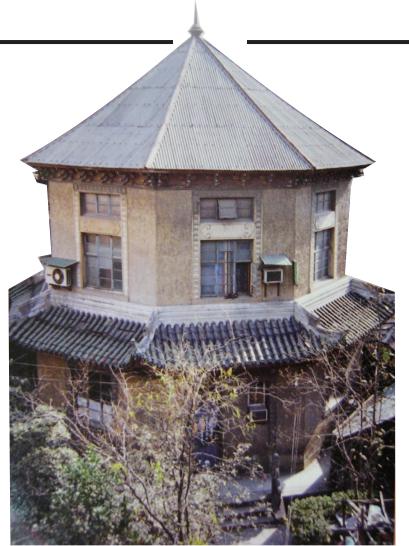
《四库全书》未竟梦

刘家是书香门第。刘晦之的父亲是进士，他的三个哥哥刘体乾、刘体仁、刘体信都是举人。他家在安徽老家有远碧楼藏书楼，祖上几代人的藏书积累对他影响很大。

刘晦之在小校经阁里藏书，立志收全《四库全书》中未收之书。他继承了刘家的藏书传统，他的藏书目录达32卷，著录图书2400余部，版本以明版为多，还有十数部宋、元珍籍。至新中国成立时，尚有宋版9部，地方志1000余部，善本达1928册，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文管会接收时的考订结果。

刘晦之曾有个惊天动地的藏书计划，他想以一己之力，创制中国第八部《四库全书》。当年乾隆皇帝下令编的《四库全书》，共有七部抄本，存放各地，但其中有不少是“存目”之书而无原书。即便是所收之书，也有很多被四库的馆臣删改过，使之符合朝廷的思想”。刘晦之立志要把《四库全书》中“存目”之书统统依目收齐，并将那些被篡改过的部分按原书改过来，以恢复其历史真面目。

因此，在他的小校经阁内，长年雇用着十几名抄书、校书的秀才，书山书海，忙碌不停。这项有点异想天开的计划实施了若干年，可惜最后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只能是一个梦想了。小校经阁的房子被征用后，已经校对、抄成的抄本被运到了成立不久的上海图书馆时，著名学者顾廷龙先生为之惊讶：“世上竟有如此胆识过人之士！”这是顾老先生亲口对笔者讲述的。



刘晦之的藏宝之地：小校经阁



刘晦之的经典藏品之一：甲骨龟片



刘晦之的孙女刘桂龄当年在月洞

成亲王府中逗留过。光绪末年，安徽贵池大收藏家刘世珩从卓氏手里收得。

刘世珩的父亲刘瑞芬曾任晚清上海道，还是著名的外交官，家里很有钱。他收得小忽雷后，又起收购大忽雷之念。这大忽雷，元代诗人杨维桢曾在诗中吟咏过，可见也是珍稀之物。刘世珩四处寻觅时，有一天与一琴师闲聊，聊到唐代宫中的忽雷，那琴师竟说，他于三十年前在沪市上曾购得一古乐器，项上刻有“大忽雷”三字！刘氏取来一看，果真“凿龙其首，螳螂其腹，形与小忽雷同。”于是大小忽雷归于一处，又过了几十年，贵池刘家家道中落，将此古物转售给了刘晦之。

小楼藏品悉数捐

“中国通”福开森在《历代吉金录》中说：“刘体智（晦之）是民国以来收藏青铜器最多的人。”著名历史学家容庚先生也说过：“庐江刘体智先生收藏经籍书画金石之富，海内瞩目久矣。”这些说法绝非信口说说。刘晦之收藏的青铜器，有四大函图录。此外，他收藏古印、古墨和古乐器，也是最好的东西。现在除了他的藏画和古墨，笔者尚未见其目录外，其余皆可从其手编的目录、图录及考证文字（现藏上海图书馆），窥见其规模。

1931年春，刘晦之的《善斋吉金录》已积稿成册。其中过去未经著录者，也就是新出土的“生坑”者，有两三百件。容庚在周明泰（两江总督周馥的孙子）家获见此编，惊为“睹此异文，振荡怡聘”。8月，他约徐中舒、商承祚，专程赴上海造访刘晦之，得见其所藏历代青铜器四五百件，他们一起拍摄、研讨，很是忙碌了一阵。临走，刘晦之赠送全形拓本三百余纸，容庚说：“整装归来，不啻贫儿暴富矣。”

当年的小校经阁里，还曾收藏着一套盛名远扬的12件镰氏编钟。这套镰氏编钟，据容庚考证，出土于洛阳故城北部的邙山。1928年一场暴雨后，一座古墓塌陷，有人钻进去打探，发现覆在上面的地层，是由木炭和小石块垒积而成，木炭和小石层下面才是墓穴。共有八座古墓，前后秘密挖掘了三年，共出土多少东西，谁也讲不清楚。这套镰氏编钟，就出自这组古墓。1931年，这套镰氏钟被刘晦之重价购得。

1951年，这处花园住宅被征用。刘晦之将这座神奇的万宝小楼里的藏品悉数捐给各大博物馆、图书馆和研究机构。其中，500箱古籍线装书10余万册，捐给上海图书馆；28000块甲骨龟片，捐给中央文化部；各类古墨数万锭，捐给了安徽省博物馆；古代兵器130件，全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；唐朝的宫廷乐器大小忽雷两具，捐给中央文化部，转藏故宫博物院，还有一些青铜器捐献给有关大学的历史系和研究所。陈毅市长曾颁发奖状，表彰他的爱国精神。

后记>>

刘氏家族世代注重读书和收藏，这使后来子孙或多或少都带些书卷气。为了纪念祖父的爱国精神和治学精神，2000年初，刘永龄出资将其祖父生前编印的《善斋吉金录》厚厚四大函重新影印出版，并分赠给国内外各大学学术团体、高等院校图书馆以及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。刘董龄是他另一个孙子，在大学里学的是理科，但是受家族影响，也是个收藏大家。

刘家后代中的优秀人才还有很多，刘松龄是飞机发动机专家；刘绳曾是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教授；刘麟生是古典文学专业的教授；刘桂龄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；刘善龄是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……第四代人中高科技人才居多。一旦海外有人来，他们还会去小校经阁走走，那里毕竟是他们的根。

小校经阁传奇



▲ 大收藏家、银行家、小校经阁主人刘晦之

上海新闻路1321号是一处较僻静的院落。院子分里外两进，迎着大门的是4棵枝粗叶大的广玉兰，长得青翠欲滴，遮蔽了院内一半的光影。这里原来的主人是刘晦之，著名的银行家和收藏家，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藏宝楼就是院内南侧的那幢二层八角小楼——小校经阁。



▲ 刘晦之的孙子一九五零年在小校经阁大门口合影（从左至右，刘松龄、刘董龄、刘桂龄）



▲ 刘晦之旧居及月洞门近影

甲骨龟片甲天下

刘晦之在小校经阁里，还曾收藏了大量甲骨龟片。在当时全国总共9万片甲骨中，他的收藏占了近三分之一，成为全国私人收藏甲骨龟片的冠军。

1936年，郭沫若在日本，日子过得很困窘，有时连毛笔也买不起。刘晦之知其博学多才，就将自己收藏在小校经阁里的甲骨龟片请人拓出文字，集为《书契丛编》，分装成20册，托中国书店的金祖同带到日本，亲手交给郭沫若，供其研究、著书。郭沫若见后叹为观止，从中挑选了1595片，先期研读考释，并据此著成了甲骨学上有重要意义的巨著《殷契粹编》，在日本出版，在书序中，郭一再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复旦大学的胡厚宣教授复员回沪后，也常来小校经阁拜访刘晦之，还带学生们来参观。打开那些用楠木箱子规整地分装起来的100箱甲骨的箱盖，满目灿然。另有甲骨拓本20册，即郭沫若看到的《书契丛编》，每幅拓片上面都附有简单的释文。这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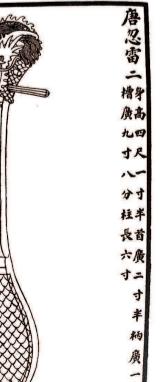
拓片与箱内的甲骨实物次序正相对照令人惊叹。胡厚宣先生曾详细查点刘晦之的甲骨实数，为28192片。著名学者陈梦家还认真考证过，认为其中有300余片为清末收藏大家徐乃昌的旧藏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这批甲骨被运到北京后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其重新墨拓了一遍，拓本题名为《善斋所藏甲骨拓本》。

唐宫乐器重入“宫”

刘家的门柱上有“古今双玉海，大小两忽雷”之联，北京故宫博物院里也收藏着两把唐代的乐器——大小两把忽雷。其实，这里说的就是同一乐器。这大小两把忽雷自唐末天下大乱之时流落民间，然而流浪了千年后，竟又奇迹般地双双完好入驻故宫。它们在民间的最后一位主人就是刘晦之，他亲手将它们捐给了故宫。

忽雷是一种二弦的琵琶，但这两把忽雷的身世十分有趣。清康熙年间，曲阜的孔尚任偶然在北京的集市上发现了其中一把，一眼认出是小忽雷。据上上世纪三十年代知名作家瞿蜕园先生考证，此小忽雷在孔家未呆多久，就转入一个满族人手里，后来又转归华阳卓氏。后人分析，这把小忽雷还曾在雍乾年间的



▲ 刘晦之的经典藏品之一：唐代乐器大忽雷